

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

冯崇义 古德曼 编

当代中国

•507

98
K269.507
2
2

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

冯崇义 古德曼 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冯崇义、古德曼编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6

ISBN 7-80092-702-4

I 华… II ①冯… ②古… III ①抗日根据地—研究—中国—
华北地区 ②抗日根据地—影响—社会发展—中国—华北地区
N. K26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4973 号

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100009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9 印张 220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80092-702-4/Z·436

定价:14.00 元

前 言

汇集在这个集子里的是提供给 1996 年 5 月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的论文。那次会议的标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根据地：政治动员与社会变迁”。能在海外举办中国抗日根据地史专题学术讨论会，是件颇为令人兴奋的事。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世界各地对根据地史素有研究的专家与会，共襄盛举。

应该说，自 80 年代以来，海内外的根据地史研究已成相当气候，俨然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有两股力量驱策着人们深化对根据地的研究。其一是这一领域多年来的学术积累、特别是新资料的大量发现，呼唤人们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思考与概括。其二是 80 年代末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那些令人目眩的巨变，催迫着学术界更细致地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的方方面面。

这部论文集的主题是社会生态与抗日根据地之间的相互关系，将根据地的形成与建设放到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背景中去考察，在把握战时特殊环境的同时，着意探讨根据地的发生、发展与中国现代化过程、特别是现代中国政治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选择这样的视角，希冀能观察到我们以往忽略的、或者视而不见的一些层面。

论文依次以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和山东根据地的顺序来安排。最后一篇关于华中与华北根据地之比较，可以视为这部论文集之结论。

论陕甘宁根据地四篇。周锡瑞(Joseph Esherick)依据张闻天

的调查材料和他自己的实地调查访问,以一个村庄为例子,以小见大,揭示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战与改革逐步展开的复杂过程;李向前也是利用张闻天的调查材料,但主要是运用社会统计方法来分析抗战时期西北农村社会的变迁;纪保宁(Pauline Keating)则是从组织问题入手来研究抗战时期共产党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农村现代化总体格局中的地位;雷颐的论文讨论共产党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措施在动员民众中的实际效果。

论晋察冀根据地两篇。魏宏运以当地农民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为基础,侧重考察随着社会变动而在村夫农妇们的内心世界中掀起的波澜;温锐考察在战争条件下由共产党所主导的、共产党与农村社区的两极互动。

论晋冀鲁豫根据地三篇。田酉如从宏观角度论述太行根据地社会性质的变化;秦富平从微观角度论述太岳根据地基层政权的变动,与田酉如的论文正成互补;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选择的是迥然异趣的视角,他从1941年离卦道暴动这一特例中看到共产党当时的社会改革政策也有失手之处。

冯崇义论晋绥根据地的论文有两个主题,一是强调非共产党抗日势力在根据地创建中的贡献,二是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角度探讨“农民民主主义”的成败得失。艾丽丝·戴维多(Elise De Vido)关于山东根据地的论文论述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党、政、军三大系统之间,以及这三大系统与当地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班国瑞(Gregor Benton)比较华中、华北根据地的论文,高屋建瓴,从社会生态、天时地利、力量对比等角度,分析华北和华中根据地各种特色的由来,并对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两支共产党军队之高低短长作了不可多得之品评。

这个集子的6篇论文译自英文。其中,纪保宁的论文由刘路生提供译稿、班国瑞的论文由陈秀萍提供译稿、戴维多自己提供中文译稿,其余由编者翻译。因为时下对外国人名书名的中文翻译很不

一致,往往给读者查阅英文原著造成不便,我们保留引文的英文标题及作者名称,算是为建立新的规范尽一份苦心。

最后,这部论文集的中文版得以问世,承蒙魏宏运教授、田西如教授、李正华博士及当代中国出版社的热心帮助,编者实在不胜感激之至。

编者

1998 年 3 月

目 录

前言	冯崇义 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1)
“封建堡垒”中的革命:陕西米脂杨家沟	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1)
抗日战争与中国西北农村社会的变动 ——兼谈张闻天的“新式资本主义”观点	李向前(25)
组织农民: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府与乡村组织	纪保宁(Pauline Keating)(69)
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变革与社会动员 ...	雷 颐(99)
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变迁	魏宏运(109)
晋察冀边区:战时政治对农村社区的影响	温 锐(122)
论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社会经济变革	田酉如(137)
论抗日战争时期太岳根据地基层政权的演变	秦富平(157)
1941 年的黎城离卦道暴动:抗战、革命与宗教	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169)
农民、知识分子与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设	冯崇义(193)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 艾丽丝·戴维多(Elise De Vido)(210)

华中与华北抗日根据地之比较

..... 班国瑞(Gregor Benton)(238)

□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
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

“封建堡垒”中的革命：陕西米脂杨家沟*

1947年12月，中国的命运面临重大的转折点。抗日战争的火灰未冷，内战的烽烟已经弥漫全国。尽管蒋介石的军队攻取了中国共产党的战时首都延安，毛泽东与其它领导人则轻而易举地到附近的乡村躲了起来。

当国共两党的军队在全国战场进行生死较量时，毛泽东给中央作了一个报告。他说，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的胜利已经使革命斗争从对根据地的防卫转变为向国民党军队进攻并消灭他们。这一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土地改革巩固了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毛泽东正确地断言，中国已到了“转折关头”^①。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1948年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胜利。

毛泽东作上述报告时化名住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这一偏僻的山村中。40年之后，我于1989

* 感谢悉尼科技大学“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史讨论会”的与会者们，特别是John Fitzgerald、李向前和陈永发等人的教示。我还要感激我在陕西的那些朋友和同仁，以及接受我访问的对象。本项目得到中美学术交流基金的赞助。

①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在中央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人民日报》1948年1月1日。

年2月到该村对老人进行访问，就住在毛泽东、江青和周恩来当年住的那间地主大院内。1942年，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张闻天曾被派到杨家沟调查农村的生活并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很多人根据他的报告对杨家沟进行了研究，以英文或日文发表^②。因此，我在访问杨家沟之前对它已有相当的了解。后来，我在陕西省档案馆及地方档案馆中发现了很多关于米脂和杨家沟的报告。我将这些报告与其它文献相互印证，试图描述那个县与那个村的历史。^③

“封建堡垒”杨家沟

杨家沟坐落于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山沟里。陕甘宁边区是人烟稀少、交通闭塞的贫瘠地区。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军队于1935年经过长征到这里。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合法存在。中国共产党的首都延安很快便成为爱

② 延安农村调查团(张闻天带领):《米脂县杨家沟调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Evelyn Rawski, 'The Ma Landlords of Yang-chia-kou in Late Ch'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in Patricia Ebrey and James Watson, *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中华帝国晚期的宗教组织, 1000—194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河地重造, 《二十世纪中国地主: 陕西省米脂县杨家沟马氏》, 《东洋史研究》, 21卷4号(1963); 河地重造, 《1930年代中国农民层分解把握》, 《历史研究》290号(1964); 深尾叶子, 《米脂县杨家沟第一次调查报告书》, 大阪, 日中共同华北农村调查团, 1995。

③ 我用相似的方法研究过另外一个县, 参阅拙文 'Deconstr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State: Gulin County in the Shaan - Gan - Ning Border Region', *China Quarterly*, 140 (december 1994).

国青年以及全球进步记者的麦加。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延安是“革命圣地”,陕甘宁边区是全中国民主与进步的典范^④。

杨家沟并不是边区的“典范”。在陕北,无定河流域的榆林、米脂、绥德三个县是这个贫穷地区中最富裕的地带。在整个边区,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 15.2 人,而绥德地区则高达 47.4 人,是平均数的 3 倍^⑤。陕北的三所最好的学校也都集中在这三个县。建有著名的中学和女中的米脂县被认为是陕北的“文化中心”。有人认为米脂县城之文明现象,比省会西安有过之而无不及^⑥。不过,在中国共产党革命中,米脂则是以其大地主出名。1942 年的一个调查报告指出:“米脂是历史上大地主集中的地方”。甚至在中共统治该地时,地主的土地也没有被没收分配。米

④ 当时关于这一地区最著名的记录当然要算埃德加·斯诺的 *Red Star Over China* (《西行漫记》)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1, original edition in 1938, 参阅他的 *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红色中国笔记》)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1956; Nym Wales, *Inside Red China* (《红色中国秘密》), New York: Doubleday, 1939; Harrison Forman, *Report from Red China*, (《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 New York: Whittlesey House, 1945. 后来的学术研究成果有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的经典性著作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中国革命的延安道路》)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他最初写作该书时的激情现已平静下来,他在最近出版的修订本中为自己降了温。匹特·斯朗(Peter Shran)出版了一部对革命很富同情的经济史著作 *Guerrilla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ensi—Kansu—Ningsia Border Region, 1937—1945* (《游击经济: 1937—1945 年间陕甘宁边区的发展》) Albany: SUNY Press, 1976. 纪保宁(Pauline Keating)写了一部很好的博士论文 *Two Revolutions: Village Reconstruction and Cooperativisation in North Shaanxi, 1934—1945*, (《两种革命: 1934—1945 年间陕西的乡村重建与合作化》),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1989, 最近的著述则集中于延安整风运动。来自中国的著作有戴晴《王实味与野百合花》; 来自台湾的有陈永发《延安的阴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0 年。来自美国的有 David E. Apter and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毛氏共和国的革命话语》),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⑤ 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第 65 页,陕西师大出版社,1991。

⑥ 袁德新:《陕北社会状况一瞥》,《新陕西月刊》第 53 期,1931 年 9 月

脂和邻县绥德的地主还被认为是“全边区的地主阶级的代表”^⑦。米脂县的地主则以杨家沟最有名,这个地主堡垒中最大的地主,是米脂和绥德纳税最多的人,也许也是整个边区纳税最多的人^⑧。到40年代,该村马家家族拥有全村的土地以及邻村或更远地方的14,000垧田地(一垧约等于三亩)^⑨。

马家的财富和权力使其家庭成员成为杨家沟不可争辩的主人。马家的佃户和雇工格外依赖其主人。主人可以随时退佃,因而佃户们每时每刻都要小心翼翼,担心一旦得罪主人便无地可耕了。151户这样的佃户住在属马家所有的窑洞中。在那种恶劣的气候中,这些佃户更加担心在天寒地冻的时候被马家赶出窑洞^⑩。而且,几乎所有佃户都欠马家的租,常常是世代欠下来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地主在收租一事上的高姿态。当地的收成每年差别很大。但是,更重要的是债务变成束缚佃户特别是帮工的绳索。长工们往往在春夏之交都要借债,长工对主人的人身依赖更强。无论什么时候,地主有招呼,长工及他们的妻子都要即刻到地主家去打杂^⑪。

地主控制并不仅仅是依赖这些强制性的依赖关系,马家也用施仁布恩来笼络人心。毛泽东和周恩来1947—1948年所住的大院是紧傍峭壁建造的。地主马新民在1929年大饥荒的时候开始建造这个大院,只雇杨家沟的工人,而且只管伙食而不付工钱。这是赤裸裸的剥削,但村民们却认为这是一种救济,使他们

⑦ 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研究》,第111页,第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该书1942年初版于延安。

⑧ 同上,第122—123页。

⑨ 《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第16页;米脂河岔区委,《关于杨家沟的土地问题》,1946年8月9日;米脂县档案馆,永久卷4。

⑩ 《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第24页;《关于杨家沟的土地问题》;米脂访问,1989年2月23日。

⑪ 《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第94—95页,第132—144页。

不至于挨饿或搬往它处^⑫。这样做的结果是，杨家沟的农民们对马家感恩戴德。实际上，在战后的土改中，共产党干部发现农民们是地主的“驯顺奴隶”，发现农民们都是宿命论者，相信“富贵由天”和“主尊奴隶”^⑬，但是，主人并不因此而感到安全，他的院墙外面日夜都有人巡逻^⑭。

1934—1935 年间，时代翻转的迹象开始显露，共产党的游击队开始在邻近的地区建立苏维埃并实行土改。马家从绥德招来一个连的军队来保卫其安全，这个连一直驻扎到 1935 年秋。村民们被组织成民团，但马家沟并没有受到直接的威胁^⑮。但是，地主们确实感觉到了事情的变化：到外村收租遇到了麻烦，地价猛跌，地主们的买地热情低沉了一段时间。而且地主们纷纷放弃高利贷经营^⑯，后来政府军的反击将当地游击队压下去了。国民党和地主的权力依旧，甚至到抗战初期也还是如此。

抗战早期

尽管红军主力于 1935 年底抵达陕北，米脂县的地主在驻榆林的当地军阀八十四师的支持下仍然在未来的两年内继续维持着往日的威风。紧接着是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和解。1937 年 7 月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米脂被划入八路军的防区。八路军于 11 月

⑫ 米脂访问，1989 年 2 月 22 日。

⑬ 《关于杨家沟的土地问题》。

⑭ 观山：《陕北唯一的杨家沟大地主》，《新中华杂志》，第 1 卷，第 16 期，第 34 页。

⑮ 《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第 31—32 页。

⑯ 同上，第 59 页，第 89—91 页，第 124—125 页，第 160 页，第 162 页，第 167—168 页；米脂访问，1989 年 2 月 27 日。

进驻米脂。但该县政权仍在国民党手里，听命于驻绥德的专员何绍南^{①⑦}。

在抗战最初几年里，国共两党都在米脂争夺优势。八路军通过民运股来支持当地的左翼势力。但何绍南是位顽固的能人，他有效地抵制了中国共产党的减租政策，并组织学生和发表演讲来抵制共产党的影响^{①⑧}。1939年到1940年间，边区周围的国共关系紧张起来，国民党抢先夺取了关中和陇东的六县城及其广大地区。中共中央在日军进攻山西之时，调王震的三五九旅回师防守黄河防线。这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军队在米脂、绥德地区处于优势。1940年3月，何绍南被指控与腐败贩毒有染，被逐出边区^{①⑨}。赶走何绍南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机会在米脂发展其势力。虽然县长仍旧由国民党人担任，但中国共产党所组建的抗救会成为实际上的权力机关。乡村基层政权彻底易手，保长及联保主任都通通换了人。中共同时也发出枪支管制令，对所有枪支进行重新登记。他们还逐步进行教育、禁止鸦片和税收、救济等方面的改革^{②⑩}。最为重要的是，中共在乡村中建立其权力。按照中国共产党所发布的文件，他们所建立的农协组织“接管了旧政

^{①⑦} 贾拓夫《关于边区土地政策问题的报告》，1944年2月，载《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资料摘编》，第2卷，第300—301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①⑧} 《陕甘宁边区革命史》，142—143页。

^{①⑨} 《陕甘宁边区革命史》，第148—159页；肖劲光《加强河防，反对造谣破坏的阴谋家》，《新中华日报》，1939年12月9日，载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上卷，第236—238页；《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1940年1月10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一卷，第305页；《米脂县县级三三制调查材料》，1944年6月，米脂县档案馆，永久卷。

^{②⑩} 王震、李景波《〔绥德〕行政工作报告》，1940年4月，陕西省档案，2（全宗号）1（目录号）—164（卷宗号）—1（顺序号）；〔以下只用数简称〕刘景范《工作报告》1942年5月9日。陕西档案2—1—164—2。

权的工作”^①。1940—1941年也是农民大批入党的年头。战后的数字显示,在米脂的2090位党员中1168名是1940—1941年间入党的,为总数的56%^②。

新党员的机会主义动机是明显的。当时吸收人们入党的一个主要口号是“不当兵、负担轻、打官司赢”^③。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很注意党的阶级纯洁性和思想的纯正,开除了15%在战前入党的党员,并警告人们不要随着上升为中农和富农而产生“资产阶级思想”,不要让地主混进党内^④。在最后这一点上,他们干得很成功。1944年后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95%的党员出身于贫农或中农,只有0.09%的党员出身于地主家庭^⑤。

不过,共产党人所采取的自上而下的策略使他们的基层政权难免留有某些空隙。1944年的一份调查表明,村长中有28.8%是共产党员,24.6%是所谓的“反动分子”,旗鼓相当^⑥。杨家沟地主的势力肯定没有受到很大的打击。最大的地主马维信最初被选为保长,后来又被选为区长^⑦。村里的七名党员只敢秘密开会来听取上级的指示,不敢向村民们公开他们的党员身分^⑧。

① 《米脂县县级三三制调查资料》,米脂访问,1989年2日。

② 《农村支部情况》,米脂档案,第6卷,日期落款为1946年,但内部资料表明应该是1947年。

③ 同上。

④ 李富春:《陕甘宁边区党的工作》,《解放》,1939年11月20日;《中国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指示》,1939年9月21日。《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第2卷,第520—521页,《陕甘宁边区党组织的现状》,1941年1月13日,《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第2卷,第524—528页。

⑤ 《陕甘宁边区党组织的现状》。

⑥ 《米脂县县级三三制调查资料》。

⑦ 《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第32页。

⑧ 米脂访问,1989年2月23日、2月26日。访问的7位党员中,6位有堂、表关系。

中共与地主

米脂是地主势力的中心,因而也是检验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与其阶级敌人结盟的关键场所。战时的政策与宣传都强调将苏维埃时代的没收土地政策转变为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都强调要吸收开明士绅及所有进步分子参加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还举行地方参政会并推行代表的“三三制”^②。

在米脂,统一战线政策是由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绥德分区专员王震来掌握执行的。新政权所发布的文件常常谴责地方政府干部对地主的“关门主义”态度^③。这些地方干部多年来一直在与地主们进行生死搏斗,当然不愿与阶级敌人共事。一份报告还指出,这些干部还担心他们的对手“太能干”^④。这些农民干部们抱怨说:“咱们流血搞起来的政权,又让地主豪绅们跑进来,敢保不会上当?”^⑤

1940年初的统一战线只不过是表面文章。国民党的县长仍官任原职,但由共产党掌权的下级权力机关认为国民党县长只是摆设而已,因而都绕过县长而找具体管事的科长^⑥。中国共产党的某些地方领导人认为“三三制”就是同士绅合作,凑人数。因此在政府机关里摆些空位,安排给那些不能作事的人。结果,既

② 《陕甘宁边区革命史》第214—219页。

③ 刘景范、刘英永、白东才:《工作报告》,1940年4月24日;王震、李景波(〔绥德〕行政工作报告);王震、曹力如《米脂工作》,1941年5月18日,陕西省档案2-1-191-2。

④ 刘景范:《工作报告》,1940年5月9日,陕西省档案2-1-164-2。

⑤ 转引自《陕甘宁边区革命史》,第219页。

⑥ 刘景范:《工作报告》。

影响工作,也没有团结好士绅^④。

尽管有来自下面的抵制,王震还是与地方精英相处很好。赶走何绍南之后,包括马新民在内的地主被中国共产党邀去共同制定新的减租减息条例^⑤。在次年的选举中,30名地方士绅参加了筹备委员会^⑥。在没有经过土地革命的米脂县等地,地主们最初对共产党深怀“恐惧害怕”^⑦。但是,久而久之,他们的阶级自信压倒了这种恐惧。米脂的地主们认为他们是传统士大夫的继承人,并不把缺乏教育的新干部看在眼里。而且,新干部们同样不信任地主,并把他们排除在日益成为实际政府的救国会之外。地主们指责这些新干部违反了党的民主原则。他们说:“民主是假的,这里没有民主”^⑧。

恐惧与疑虑为现实主义的考虑所冲淡,新形势要求地主们灵活地对付其阶级对手。无论如何,地主支付了因战争而变得非常沉重的税,他们在策略上也与新政权建立起个人关系。至少,他们中的很多人允许甚至鼓励他们的女儿嫁给共产党人。杨家沟最大的地主马维新有两个女儿嫁给共产党人,其中一位嫁给绥德分区秘书处处长。^⑨实际上,米脂的妇女教育是如此之好,(绝大多数受教育的女性都是来自富有家庭),以至于该地成为

^④ 《米脂县县级三三制调查资料》,《陕甘宁边区革命史》,第219页,227页。所引材料下文还接着说,这种现象在高干会议后克服了。

^⑤ 贾拓夫《关于边区土地政策问题的报告》。

^⑥ 米脂县选举委员会,《准备阶级工作报告》,1941年7月26日,载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整风文献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第4卷,第136页。

^⑦ 《中央局关于三三制的指示》,1942年1月30日。《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第2卷,第67页。当然,这比经历过土地革命的地方要好。在经历过分地的地方,地主们对共产党有“相当深的仇恨”,同注40。

^⑧ 王震、曹力如《米脂工作》。

^⑨ 《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第25页,32页;刘景范,“工作报告”。